

没有硝烟的战争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考察

主 编

王文正 张文亮

副 主 编

程玉海 王庆功

山东人民出版社

没有硝烟的战争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考察

主 编 王文正 张文亮

副主编 程玉海 王庆功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没有硝烟的战争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考察

主编 王文正 张文亮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93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9—00950—7

D·279 定价: 1.80 元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 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王文正

青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同样，青年也是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正如杜勒斯早就鼓吹的那样：他们要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这里的第三、四代人身上。

然而，在几十年和平环境下长成的一些青年人，本来就对帝国主义的反共实质认识不深，对国际间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殊死性、残酷性、长期性、复杂性知之不多，而且又天真、单纯、富有幻想。这就很容易丧失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性。这是极为危险的现象，我们不得不再次敲响警钟，真正认识到对青年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的紧迫性。

要认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首先就应了解1917年10月革命后，特别是二战后帝国主义反共战略方针的变化。因为，正是从十月革命开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与斗争，也随之发展为两种国家制度

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由此开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反共战略的中心任务。但是在当时，即俄国一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企图主要以武装干涉、军事包围等手段消灭苏维埃俄国，所以，在当时，武装干涉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反共战略的主要之点。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多国实践的到来和帝国主义武装反共阴谋的破产，遏制与“和平演变”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反共战略天平的两端。60年代后，“和平演变”在帝国主义反共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成为主要的反共形式。显然，无论是武装干涉、军事遏制，还是“和平演变”，无疑都服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其实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决无两样，而对这一点的任何认识上的动摇，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要认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性，还必须看到它比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军事遏制更富有的欺骗性和进攻性特点。因为，这种长期的、多方位的和平渗透，往往能够在缓慢的潜移默化中，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失去警惕性。另外，帝国主义往往打着“经济援助”、“自由交往”、“维护人权”的花样旗帜，实施“和平演变”，从而在一个时期里，使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人，为此所迷惑，使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发挥作用的场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达到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开始变质的目的。显然，“和平演变”战略所富有的进攻性，正是寓于它的渗透性和欺骗性之中。目前，一些国家出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帝国主义发出的打一场消灭社会主义的无硝烟的战争的叫器，

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代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主要内容。

为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还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自身的完善，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焕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措施。这两者恰好是从根本上防止“和平演变”的基础性措施。当然，由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搞改革开放缺乏理性认识，从而容易受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侵袭，在一个时期内加大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艰巨性。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为从根本上粉碎“和平演变”阴谋，就必须搞好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辩证法就在这里。

希望此书的出版，对广大青年和学生了解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和危险性，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能够有所助益。

1990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一 战后初期帝国主义的反共阴谋与“和平演变”战略 的形成	18
1. 战后初期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	19
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和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19
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全球称霸计划 ...	21
反法西斯战时同盟的解体，冷战时代的到来	24
2. “遏制”——冷战时代帝国主义的基本反共战略	31
凯南关于“遏制”的理论与美国的“遏制”战略	31
马歇尔计划	37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它军事、政治组织	39
3.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	42
社会主义阵营反击帝国主义“遏制”战略的措施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44
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遏制”	46
“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49

“和平演变”战略的初步实施	53
二 冷战时代的逐步结束, “和平演变”战略地位的逐步上升	58
1. 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松动” 帝国主义在东欧事件中的“和平演变”活动	59
冷战气氛的减缓, 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松动”	59
东欧国家的内部变化及事件	63
帝国主义在东欧事件中的“和平演变”活动	67
2.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地位的上升	
两大阵营的分化	72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理论	76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实践	83
3. 东西方“缓和”形势下的“和平演变”战略	87
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形成	87
尼克松主义与“和平演变”战略	90
卡特的“人权外交”	97
三 80年代的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	101
1. 新冷战——冷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101
2. 新冷战中的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	106
通过“公开外交”加强反共宣传和思想渗透	107
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势力”的出现	110
促使东西方经济“融为一体”	113
3. 全面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新时期	114
80年代中期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	114

正在展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15
四 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127
1. 坚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方针，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127
2. 反对“和平演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重 要环节	132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32
改革开放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34
3.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抵御帝国主义“和平 演变”的能力	137
要把思想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138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	141
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	143
4. 两个文明一起抓是抵御“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	145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抵御“和平演变”的物 质条件	146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抵御“和平演变”的重要 保障	147
后 记	150

导 言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现代国际间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战后 40 多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从未放弃用“和平演变”战略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对此却并未一贯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在出现国际缓和局势时，人们往往过于沉浸于世界和平潮流之中，对于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以及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缺乏应有的清醒度。这一点在当代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显明，这是极为危险的现象。因此，以历史事实为根据，考察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规律以及各个时期的特点，总结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无论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状况，还是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反共战略和国际间阶级斗争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出笼，虽然是本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事情，但它的产生，首先起源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斗争，它既是这种斗争近百年来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战后帝国主义反共战略变化的产物。

反对和最终消灭共产主义是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从未放弃过的政治目标。正如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共产主义还被称为“幽灵”，而仅仅在欧洲大陆徘徊之时，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就已经为驱除它结成了“神圣同盟”。此后，在19世纪中、后期，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又动用了各种手段试图阻止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并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政党。尽管如此，由于1917年前社会主义尚未由理论发展为实践，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想体系间的对立和斗争，也未发展为国家制度间的对立与斗争。

1917年10月，当“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报道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到来，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从而世界上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体系的时候，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反共活动，才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总体战略的领域，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全球反共战略，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清除和消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也就成为帝国主义反共战略的基本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倒行

逆施，人类世代创造的世界文明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这一两大社会体系形成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国际条件，造成了美、英、苏战时三国联盟，以及包括各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和政党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然而，战时同盟没有消除两大社会体系间的对立和斗争，随着战争的逐步结束，联盟的色彩也日渐消退，并为灰色所覆盖。由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国际政治上分歧和冲突开始加剧。特别是随着战后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多国实践时代的到来，战时短暂的“蜜月”，终于成为历史的过去。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间又组成了反共联盟，它们采用包括武装对抗和有限度的局部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抗衡，并在两大社会体系以外的所谓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的“空间地带”，构筑营垒，防止所谓共产主义“瘟疫”。这时，反共活动再次上升到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总体战略的中心位置。劳合·乔治、威尔逊时代的阴魂复活了，他们未完成的通过武装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来彻底消灭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又历史地落到了战后一代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身上。由于战后帝国主义内部力量的变化，美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盟主”，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推行全球反共战略的“旗手”。但由于战后的特殊形势，决定了他们已不可能象 1917 年后那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他们没有力量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消灭共产主义的所谓“世界大战”，而只能把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活动，保持在军事

对峙和有限的局部战争等范围内。所以，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式，以最终消灭社会主义为战略目标的“冷战”应运而生。杜鲁门的名字和“冷战”时代也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为实现帝国主义反共战略目标，战后帝国主义集团相继创造了两种基本形式，即“遏制”与“和平演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形式不过是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反共斗争中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区别于上个世纪的更高的形态，即国家外交战略一部分的形态。因此说，“和平演变”战略的出笼是两种思想、两种社会体系长期斗争的结果。

应当指出，到60年代末，从战后开始的“冷战”状态被“缓和”所替代，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以及两大社会体系间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帝国主义最终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并没有任何改变，由此所决定的反共战略的两种基本形式也一脉相承、交替使用。

在研究战后帝国主义反共史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使用“遏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的概念，或者用二者中的一个形容帝国主义的“反共战略”，或把二者统称为“反共战略”，甚至在一定时期，把“遏制战略”统称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本书中，我们也不断的使用了这种俗成自然的概念。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全球反共战略、“遏制”与“和平演变”战略，是不同层次上的战略内容，它们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般而言，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并不完全等同于“反共战略”。因为国家外交战略，既包括了他们处理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包括了他们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既包括了维持和实现自己国家利益及安全的目标，也包括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共产主义的反共目标。所以，“反共战略”是帝国主义外交战略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战后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表现了两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把反共战略与外交战略融于一体。在这样的时期，反共战略和外交战略基本是同义反复。二是在保持反共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使反共战略成为国家外交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外交战略”和“反共战略”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解释，不仅来自国家利益客观存在本身，同时还来自于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又总是和领导人自身的思想意识、统治阶级的情绪密切相连。因此，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往往起着巨大作用。在一定时期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又总是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在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 20 多年间，美国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一种判断，即共产主义威胁了“自由世界”的政治秩序及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与保卫美国的价值传统、政治秩序、国家安全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成为外交思想的主流，

并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把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敌对国家和潜在威胁。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出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所讲的一段话，正是这种思想状态和情绪的真实写照。他说：“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上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正在设想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它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因此，从反共思想及目的出发，构成了50~60年代的以“两极对抗”，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为基础的外交战略。并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集团。在欧洲组织了对抗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经济、军事、政治集团，在远东组织对中国的包围和经济封锁，甚至不惜在中国周围发动战争。由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与外交决策无不以此为轴心摆动，所以这一时期本来属于不同层次的战略内容，完全混为一体。这也是反映“两极对抗”的“遏制”战略，时而被用以概括“冷战”时代的外交战略，时而被用以概括全球反共战略的原因所在。

尽管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几届美国总统，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不得不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出发，而参加朝鲜谈判、日内瓦谈判、50年代中期后的美苏首脑会谈，以及签订达到有限目标的协议。但从总体上说，意识形态，反共战略仍然是支配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保持反共意识与外交战略的一致性，就是当他们采取一些现实性考虑时，也竭力寻找一些象征性的方

法予以弥补。1955年美、苏、法、英四国最高级会议前夕，身为国务卿的杜勒斯担心苏联人利用这次会议造成他们同美国握手言和、“平起平座的地位”，他提醒艾森豪威尔“有时不得不同俄国人一起照像，可要扳着脸啊。”^①当然这也是杜勒斯在日内瓦不愿与周恩来握手的原因。所以这一时期，反共意识形态与外交战略融为一体。

60年代后期，随着两大阵营的解体，第三世界的崛起，美、中关系的解冻，美、中、苏世界“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两极政治本身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世界多极政治格局中，美苏两国对抗仍然存在，但它和杜鲁门时代的两极对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自身安全受到了来自美苏核竞赛和核对抗的威胁，对美国来说，继续玩弄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完全等同的外交战略，已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于是，利用多极政治的制衡和牵制，在表面上淡化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更大程度上以美国安全为出发点的“均势”战略问世了。这一时期，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消除共产主义威胁，在表面上已不完全等同于外交战略，而成为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当然，美国外交战略的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反共活动的削弱，它只不过是在新形势下变得更隐蔽而已。尼克松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虽然都试图加强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里根政府初期也导致了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但是，由于历史条

①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3~194页。

件的变化，他们终未能完全回到杜鲁门的“两极对抗”外交战略时代。

当然，就帝国主义反共战略本身而言，它也就包括了战略目标及实现的战略方针两个不同层次。总的说，战后40年间战略目标始终未变，而战略方针却不断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它都在“遏制”和“和平演变”之间选择。如果把帝国主义反共战略比作一架天平，那么，“遏制”和“和平演变”就是天平的两端。由于制约两端砝码的力量又来自于帝国主义外交战略，所以当“遏制”一端占据主要地位时，这一时期的反共战略，往往被称为“遏制战略”，当“和平演变”一端上升为主导地位时，这一时期的反共战略又被概括为“和平演变”战略。但无论怎样变化，天平的两端同属于帝国主义反共战略，并和反共战略一起纳入帝国主义外交战略之中，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考察“和平演变”战略的演变进程及其规律，必须把它纳入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即帝国主义外交战略变化的范围内进行。

如果在这一个基础上认识“和平演变”战略的演变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正式提出（1946—50年代初）。

这一时期也是突破战后帝国主义反共战略的单一性，由单一的“遏制”发展为“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双重反共战略时期。

战后初期的美国驻苏代办，后来又成为美国国务院政策